

非洲之旅掠影

东非枢纽——内罗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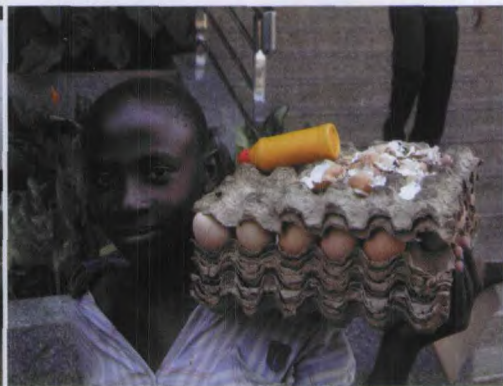
文、图 / 伊 夫

从卡塔尔首都多哈转机，向南飞行总共需要5个多小时，才能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大约两个小时，就掠过了除了石油和沙漠的沙特阿拉伯领土，开始飞行在亚丁湾的上空。对岸的非洲大陆已经近在咫尺！

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上空晴空万里，只有极少朵薄薄的白云。脚下是干燥、火红的大地，没有人烟与城市，没有河流与公路，只有薄云的黑色投影。进入肯尼亚境内时，除了土地由红变褐外，极少出现绿色和村庄。赤道附近的首

都内罗毕，就处在无边无际的黑褐色荒原包围之中。

由于内罗毕地处肯尼亚中南部的高原地区，因此中午时分的内罗毕，也是轻风习习，分外凉爽。但阳光格外刺目，强烈的紫外线晃得人睁不开眼睛。一出机场，就立刻被各旅行社雇用的“托儿”们团团围住。这些身材魁梧的黑人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争先恐后地把印有野生动物图片的宣传册塞进我们手里同时高声吆喝：“纳库鲁、纳库鲁！”或者“马萨依马拉、马萨依马拉！”



湛蓝的天空下，通往市区的道路一侧被铁丝网隔离。司机解释说：“阻止野生动物跑过来。”沿途的树枝上不仅挂满小灯笼般的鸟巢，而且树梢上竟然还栖息着硕大的秃鹫。

内罗毕不仅是肯尼亚首都，也是东非共同体三国里最大的城市。建都 100 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人类居住中心总部在内的国际性组织以及不少国际商业、新闻机构的地区总部均设在此。

在内罗毕的 CBG 区，一幢幢高档写字楼拔地而起。西服领带的男士与西服裙的白领丽人目不斜视地从容前行，如果问路，他们待人礼貌、热情，谈吐文雅、大方。普通的内罗毕市民也都很和善、友好、礼貌。迎面走来，必用斯瓦希里语问候一句：“扬保！”

另一个意外的是，肯尼亚人手机的拥有量非常高，到处都能看见买电话卡和打手机的人。从出租车司机到宾馆服务生，从白领到学生，手机的普及率一点儿不比北京低，这与我们平常见到的非洲画面截然不同。

鉴于媒体报道太侧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即使偶尔报道非洲国家的新闻，内容也大致是干旱、饥荒、传染病、内战、部族之间屠杀和政变。所以，老百姓对于非洲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上世纪 60~70 年代。

由于无知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偏见，临来时居然还有朋友嘱咐道：“那些国家还在闹独立，不安全。”或者“经常发生政变，可要小心啊！”津巴布韦属于独立最晚的非洲国家之一，也早在 80 年代就收回了主权。至于军事政变，90 年代以后，非洲各国相继实行了多党制，军政权早已没有了生存空间。

眼前内罗毕的中心区与欧洲的城市没有太大差别。整个城市规模和水平，绝对比东盟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高出几个档次，比如西贡、马尼拉甚至曼谷和吉隆坡等等。

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成为内罗毕城市建筑的一大特色，周边是鲜花与绿地；国立博物馆、铁路博物馆、国家艺术馆等宏伟高大的建筑随处可见；内罗毕大学、肯雅塔大学和使馆区更是花团锦簇、绿树如荫；广场花园的四周是时尚产品的广告牌，在这些跨国著名的大企业里，还包括我们近邻韩国的 LG。

城市虽好，不过也有许多地方是禁止拍照的。1998 年美国使馆被炸，结果紧邻美国大使馆的一幢造型独特的建筑物，游人也不能拍照了。士兵把每个试图拍照的游人当场拘留，先当作恐怖分子审讯一番，然后才不了了之地放出来。

离开引以为荣的中心区，内罗毕旧城汽车站附近，或许更能让人领略和体味肯尼亚百姓生活的另一面。在肯尼亚，火车的客运量极小，除每周只有三趟驶往第二大城市蒙巴萨的火车，此外就关门大吉。

汽车是绝对的运输主力，在内罗毕东南部，聚集着大量

的长短途大巴和中巴，远至邻国埃塞

俄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的跨

国长途汽车，近

到附近十余公里

的郊外。这里的人口密度之大，

丝毫不亚于北京的大栅栏和王府井，比北京

相应的长途汽车站，如赵公口、丽泽桥、西直门、东直门都至少热闹十倍。

运输公司众多，竞争异常激烈。同一线路可以开出不同车价，如果你肯讨价还价的话，长途车基本能够正点发车，因车次多所以一般都有座位。密密麻麻的候车人和密密麻麻的汽车集中在那一地区，其混乱程度可以想象。别看车站永远是人头攒动，但上车时人们很有秩序，虽然蜂拥地将车包围，可从没有诞生拼命乱挤、乱撞的勇士。

司机在人口如此稠密的道路上并没有减速慢行的意思，一辆辆坐满乘客的车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从清晨到夜晚，永远是生意兴隆、吞吐两旺，与每天下午 6 点就关门的火车站形成鲜明对比。市内的公共汽车分两种，气派的大巴车和被涂抹得花花绿绿的中巴。晚上，中巴车内的彩灯全部点亮，司机将音乐声放得很大招摇过市，代替了售票员的吆喝声。

若想在内罗毕免费欣赏音乐不难，除了晚上的公共中巴外，到处都有小酒馆一类的“练歌房”，彻夜飘出节奏简单、明快的非洲音乐，强行挤进来我们宾馆的门缝里。这些立刻能让人闻歌起舞的乐曲，其实就是永远重复着一个旋律。年轻的黑人男女乐此不疲地跳啊跳啊，直到天亮才肯停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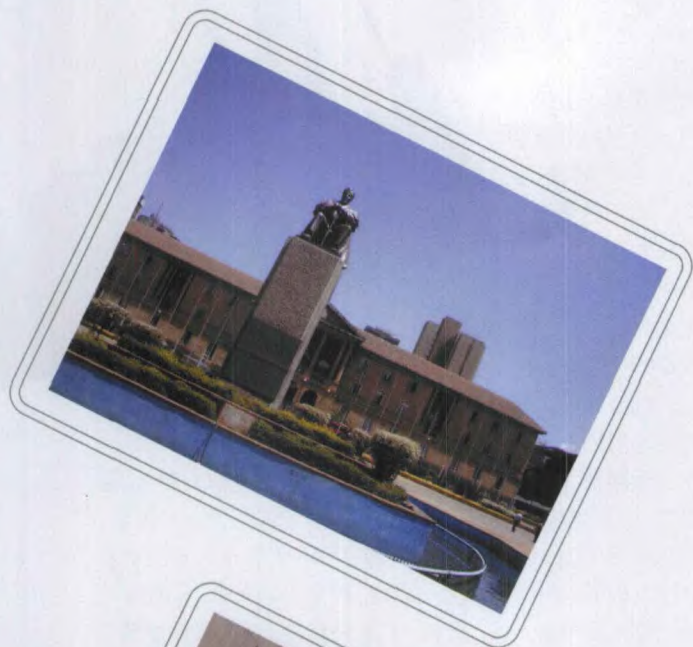
近年来，总报道中国人在非洲被抢事件，我们到内罗毕第二天也领教一回，在游览车闹市区缓慢行驶时，我们正伏在窗口专心致志地拍照，不料窗外伸进一只黑手，迅速地拎走了装有护照和外币的书包。急忙冲出车门大声喊叫地追赶，周围的黑人随意也齐声高喊助威，并且帮助堵截。小偷最终无奈地弃包而去，当地人真诚地鼓掌为失而复得的我们欢呼。

这绝对不是非洲独有的社会现象，在意大利的罗马、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中国人不是也经常遭遇过类似的惊吓吗？在中国，光天化日之下都能够被抢劫，而且没有那么多见义勇为的雷锋挺身而出。

内罗毕是非洲重要的交通枢纽，除公路外，南郊的恩克贝西国际机场，有几十条航线，与数十个国家的城市有联系。后来从这里分别去蒙巴萨、纳库鲁、坦桑尼亚、乌干达、塞舌尔和回北京等总共是六进七出。

内罗毕在非洲如此重要，以至于前不久我国在内罗毕





大学开设了孔子学院。不久的将来，在一个到处都充斥着英语的国家里，漂泊在异乡的中国人，也将能听到熟悉、亲切的汉语声音了。

乌干达大选前夕

2月7日夜间12点，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乘大巴出发，经过肯尼亚第三大城市纳库鲁、西部重镇基苏木后，到达肯乌边境小城布西亚时，已是上午9点半。肯尼亚、坦桑尼亚与乌干达同属东非共同体成员国，因此相互入境时手续便捷。在我持有肯尼亚签证的护照上，边检人员懒散地盖个章，至于例行公事填的出境表，她连看也不看，只是略有些好奇地问一句：“China?”

至于入境，更是简短，乌干达一方连入境表这一形式也彻底省略。与肯尼亚人一模一样的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Chinese、Japanese、Korean……”我知道，在他们眼里，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是遥远的东方人，正如我们难以区分肯尼亚人、坦桑尼亚人与乌干达人一样。

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乌干达，留给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是——30年前曾经有一个被称作“吃人魔王”的阿明总统、几年前导致大规模传染、大面积死亡的“埃博拉”病毒、叛军对不同部族的血腥大屠杀及高比例的艾滋病感染者。

与高原上凉爽的内罗毕相比，维多利亚湖附近的坎帕拉闷热得让人无处藏躲。赤道的阳光分外灼热，但当地老百姓似乎并不惧怕紫外线的照射，太阳镜、草帽、遮阳伞之类的防暴晒装备一概不用。

首都坎帕拉人口不足百万，民居分布在数十个山丘上，街道狭窄、房屋破旧，我们北京俗称的“小公共”，是市内公共交通运输的主力。这些车辆充斥在城市主要干道，售票员轻倚在门口探出大半个身子对着行人大喊大叫，相当于我们北京小公共售票员叫嚷的“一块一位，走了，有大座！”

不过，更多的行人好像更愿意选择步行。满街都流动着大步流星的行人，骑自行车是不现实的，起伏的山丘妨碍了自行车的普及。与其挤进低矮闷热的小公共，或许倒不如靠自己的“11路”。

街头游荡着各种小贩，香蕉、木瓜、电话卡、香烟以及熟鸡蛋。香蕉等热带水果价格低廉，其他都比中国贵。鸡蛋每个约合人民币0.8元，在东非各国，算是比较便宜，所以生意不错。小贩卖完鸡蛋后，顺手撕一小块报纸，将塑料小瓶里的细盐撒上几粒。

见识过邻国首都的一位白领丽人，面对自己的家园惭愧地比较说：“内罗毕是个城市，坎帕拉则是郊区。”由于年久失修，除了市中心的帝国饭店、希尔顿饭店少数几个星级大酒店外，整个城市，尤其是老城区的建筑都失去了色彩。唯有满墙张贴的政治人物标准像花花绿绿的，给这个枯燥

的城市增添了色彩与活力。

自1962年乌干达独立以来，政坛一直是军政权反复接替，在1990年后才逐步开始平稳。1996年军政权领导人穆塞韦尼成为了民选总统。去年7月，乌干达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实行多党政治。

除了已经连任10年的现总统外，还有诸多的总统候选人积极参加总统竞选。这些或年轻或年长、或文雅或刚毅的形象，都以最佳的笑容凝固在照片上，他们各自的支持者把这些潜在的总统画像分别张贴在最醒目的墙壁、楼顶、车厢、边境检查站、电话亭、商店门口甚至农贸市场卖肉的摊位上。

报纸每天都有关于各个候选人演讲的图片、文章。为了强化知名度，有的更别出心裁，将候选人画像制作成小灯笼，高悬在路灯上或覆盖住户外的大广告牌上。在邻国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上，亦即将开始大选的选民也采取类似的宣传手段，用候选人画像糊成小灯笼，一排排地悬挂在居民区最为显著的地方。

去年11月，乌干达议会修改宪法，取消了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这样，不被西方看好的现任总统穆塞韦尼，获得再次角逐总统的资格。对于其他候选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现实。因此，反对派的活动一直很活跃，不断利用穆塞韦尼胞弟与妹夫的腐败丑闻大做文章。

据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在去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乌干达列世界腐败现象严重国家排名榜上的第13位。然而，普通老百姓却不太在乎这些裙带腐败。他们更看中穆塞韦尼10年来取得的成绩——自1996年以来，乌干达国内安全状况得到改善；经济年增长6%；艾滋病感染比例在下降（2001年9月，因在防治本国艾滋病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被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署授予“世界防治艾滋病突出领导成就奖”）。

尽管缺医少药，但乌干达国民在政府开办的医院里，享有几乎免费的医疗救治；中小學生也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甚至在大学，政府为了降低由性传播感染的艾滋病，特意制定奇特的鼓励政策：如果可以证明是处女，也能够免费。

从中国宁夏来坎帕拉开饭馆的黄女士称：我要有选举权，我就选穆塞韦尼。我来这里7年了，乌干达这些年经济不错。本来我曾经想去津巴布韦谋生，可那里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乌干达虽然比那边穷，但挣钱还是比国内容易。

黄女士瞥了一眼饭馆对面的其他候选人肖像自信地表示：她的想法代表了2600多万乌干达人的民意。不过，当地选民很少像没有选举权的黄女士那样坦率。他们大都不愿意透露投票给哪位候选人，但多数人最关心安全与和平。

的确，乌干达的国内政局一直不太平静。昔日邻国扎伊尔（今刚果“金”）的国内战乱，乌干达曾不可避免地深度

卷入。另外，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以邻国苏丹南部地区为基地，不断骚扰乌干达北部地区，造成数万名平民死亡、140多万人流离失所。经过多年谈判，去年苏丹政府勉强同意乌干达军人越境清剿“圣灵抵抗军”。

目前的坎帕拉似乎也比东非共同体的其他伙伴国更缺乏安全感。比如内罗毕，尽管小偷较多，抢劫也时有发生，但保安还没有武装到实枪荷弹的地步，达累斯萨拉姆更是显得风平浪静，但坎帕拉到处是穿制服的持枪人。银行门外、商店附近、教堂旁边，持枪站岗者比比皆是。

“那些保安的枪没有子弹，只是吓唬人的。”黄女士则不屑地笑道，但接着说：“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中国人很容易被人抢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喜欢持有大量现金而不是一张小巧的银联卡。

一周后，乌干达广播公司电台报道，两名持枪者当天在首都坎帕拉西南部老城区向正在集会的反对党支持者开枪，造成4人死亡。

又一周后，从维多利亚湖畔到战乱地区，乌干达这个东非炎热的内陆国开始了25年来举行的首次多党大选。乌干达选举委员会设立1.6万个投票站，供1040万合法选民投票。据报道：尽管有人抱怨，选举准备不足、秩序混乱。但截至23日下午，投票率超过60%。两天后，穆塞韦尼在反对派抗议声中以59%的选票胜出。

